



快樂的「愛樂者」。
攝影：Fadil Berisha

快樂的「愛樂者」

嚴謹的技巧 歡快的音樂

管弦樂團的樂手，身穿黑色燕尾服套裝，神情專注地演奏，不論是外形或是音樂，都給人嚴肅的感覺。如果你不認識這幾位樂手，或許會誤以為，來自頂尖的維也納愛樂和柏林愛樂的樂手，會是世上最嚴肅的音樂人。事實卻剛好相反。

文：胡銘堯 圖：香港環球唱片提供



身上。」起初，愛樂者這個名字，是在奧地利環球唱片的朋友和他一起命名的。雖然他們的音樂輕鬆可親，但他沒有為樂團起個惹人注目的名字。「叫『愛樂者』，是因為我們都從愛樂樂團（philharmonic orchestra）而來，我們都愛音樂，正如philharmonic這字的本意。我們更希望將不同的文化，以音樂聚焦起來，傳播的是和平的信息。」

盛讚香港小孩熱愛音樂

「愛樂者」來港行程匆匆，除了有音樂會和官方活動外，還參加了大學的大師班和到訪小學演出，更和小學的同學們一起合奏。科瓦契盛讚香港小朋友的音樂有水準之餘，亦感到他們熱愛音樂。「以肯定的態度、正確的技巧和開放的心來演奏音樂，這是最令人讚歎的。」科瓦契說不論是音樂會還是學校，聽的人都直接接受他們的音樂，這樣給他們更多的力量去演奏。

這班快樂的樂手，在學校和同學演奏完畢，在台上第一時間拿手機來與同學拍照，打成一片。「香港人給我們不少力量，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會再來演出。」

台下的他們愛說笑，愛聊天，閒時就拿手機來拍照。台上的他們，以音樂嬉戲。演奏的音樂，開心得逗人歡笑。這幾位樂手，組成了名為「愛樂者」(The Philharmonics)的樂隊，早前來港演了一場音樂會，還走訪了學校，演奏給學生欣賞。

「愛樂者」一共七名樂手，都是來自維也納愛樂和柏林愛樂樂團的全職樂手，組成「愛樂者」算是他們的副業。「愛樂者」演奏的音樂，輕鬆地把古典音樂與世界多樣風格混和——爵士與探戈、中東與猶太。他們的音樂短片《Music in the Air》，剛在2012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中場休息時播出，令他們一時聲名鵲起，就連他們的新唱片《Fascination Dance》也登上了奧地利全國流行唱片榜。他們的音樂，既輕鬆又高雅。

「原來音樂可以輕鬆地享受。我們演奏的音樂來自不同的文化傳統，但我們有心得把古典音樂訓練中最嚴謹的訓練，造句、聲響、合奏等等技巧，帶進這些音樂裡。」來自斯洛伐克的團長蒂博·科瓦契(Tibor Kováč)如此形容樂團的音樂特性，「在這組合裡，有着世界首屈一指的樂手。」

世界首屈一指的樂手

這幾位集演奏、創作、即興等才華於一身的樂手，在2007年某天討論起組班。「那是在東京一次演奏後，我們一邊吃着shabu-shabu，一邊討論演些不同風格音樂的想法。」想必那次也有不少啤酒吧，我插嘴

說。「哈哈！當然，我們想，音樂向來也是件令人輕鬆的事。」

組合起初只有三人，後來變成現在的七人，演奏的音樂，不少都有濃厚的東方氣息。團員很多都來自東歐，似乎東歐的氣息已然滲進他們的音樂中。演奏改編布拉姆斯著名的《匈牙利舞曲》，很有klezmer的味道。不過，原來國籍相近，只是偶然。「我們走在一起，是因為大家都愛在音樂上冒險。我們演奏認真，但又愛發掘音樂不同的可能，又愛即興地合奏。」即是我們常說的「jam歌」吧。「但我們堅持水準。都是我們所受的訓練的要求吧，造句、發聲、呼吸，我們都不輕易放下這些要求。」

科瓦契是樂團的召集人，演奏第一小提琴。他年少的時候，經常要為他當歌手的母親伴奏。「母親是爵士樂隊的成員，於是我自懂事以來，就要幫她忙。由打敲擊樂到吹口琴，總之拿起什麼樂器，就來一起演。」音樂不單自幼成為科瓦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愛樂者」的幾位樂手即興與香港英華小學的學生一起演奏。

更可說是他的呼吸。「音樂的呼吸，就像人的呼吸般自然：旋律有它的氣息。後來我拿着小提琴，就是要模仿唱歌時的呼吸。」科瓦契形容，這小時候的經驗，像注入了他的血管一樣，成了他的一部分。

以古典的風格演世界舞曲

血液中除了呼吸，還有舞蹈。他們的唱片《Fascination Dance》，就是一系列不同風格的舞蹈，全都是由團員們一手改編。除了布拉姆斯、德伏拉克、舒伯特的舞曲，還有皮亞梭拉的探戈、積·高利亞的爵士、《屋頂上的提琴手》和《My Favourite Things》的調子等等，全都令人有翩翩起舞的衝動。

他們輕鬆的音樂，隨着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而廣泛傳播，他們的行程亦變得緊湊，今年會到薩爾茨堡、聖彼得堡等地演出，還會跟以一張嘴玩弄不同人聲的著名樂手Bobby McFerrin於維也納演出。

正當樂團的繁忙排練，有沒有和日漸受歡迎的「愛樂者」發生衝突？科瓦契說，每一位樂團樂手，都參與不同的室樂組合。「演奏是我們的生命，室樂演奏亦是我們的固有傳統。我們總有辦法去遷就樂團的演奏和排練，互不干涉。」

那次在東京享用shabu-shabu時，他們有沒有料想到今日會如此受歡迎？科瓦契說，起初他們本來是想成立一隊三重奏。但後來發現，身邊喜愛冒險的人其實不少。現在，他說「愛樂者」是他繼他的家庭和樂團後，最重要的事業。「我要推卻其他獨奏的邀請，還要離開有份參與的室樂組合，全神貫注放在『愛樂者』

香港大會堂 50周年

大會堂的前世今生——從大會堂的變化看香港（1）

舊大會堂「死於非命」

港督柏立基爵士在香港大會堂奠基（1960年2月25日）及落成啟用（1962年3月2日）的揭幕儀式上，都特別提及舊日的大會堂，那是較今年慶祝五十華誕的香港大會堂早了超過一百年的香港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和今日的大會堂可說是一脈相承，亦見證了香港的歷史轉變。本系列八篇的文稿，將聚焦新舊兩個大會堂已被人忘記或忽略的「小事」，來看看香港的變身，是筆者獲香港文匯報委託撰寫大會堂金禧紀念的專著《現代香港的起點——大會堂五十年的故事》（3月2日面世）衍生出來的「副產品」，亦是在專著中欠缺篇幅下的補充。

華人男女分開進場

舊大會堂於1869年11月2日由愛丁堡公爵（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揭幕，是一座左右對稱、古色古香的歐陸建築物，內有劇院、圖書館、博物館等設施。舊大會堂的興建源於1860年初，一群熱心人士為改變社會生活質素組成的「爭取建設香港大會堂臨時委員會」，於1863年12月31日發出一份傳閱文件，很明確地提出要興建大會堂的原因：「對於此類公共建設的迫切需要，已不必詳加解釋。目前，若要舉辦任何與公眾或社會有關的活

動，在全港九均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點，除非借用香港會所，但這卻會中斷該會的正常活動，對會員造成極大不便。義勇軍成立晚宴的籌備，困難重重；去年冬天雅仁會舞會因缺乏場地而被迫取消；本地的職業藝術家目下處於極不利的境地；這些只是缺乏大會堂而引致的種種不便中的寥寥數例而已。委員會相信，自好望角以東的所有重要外國城市均設大會堂，而新加坡大會堂亦已於最近建成。對比之下，香港沒有大會堂實是缺乏公益精神的見證；相信有關方面不會容許這種現象長期持續下去。」其後委員會向公眾籌得十萬元，港府免費撥出當年香港第一條大馬路皇后大道的一塊海旁地，並採用公開比賽選出的一位法國人M.Hermite設計的圖則興建。

舊大會堂啟用之時，正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只有廿八年的殖民地初期，大會堂的興建背後，必然從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利益來考慮，建成後臨時委員會按不牟利方式來管理，雖然英文名字取名為City Hall，用以表示是為全體市民而設，但不但大會堂的建築充滿殖民地色彩，而且一直只是上流社會、當時外國人和「高等華人」的社交場所。最初開放時，不但將中外遊客嚴格分成上午與下午的不同時間入場，不許

華洋雜處，而且將華人男子和華人婦孺亦分開時間進場，不許男女混雜。攜帶妻子女兒同遊博物館之樂，只有非中國籍的男子方能享受。（見香港全紀錄卷一P82）

無人反對拆卸有因

在這種情況下，舊大會堂顯然是當日殖民地統治階層與上流社會出入的場地，而在管理營運上顯然亦出了問題，隨着歲月推移，到上一世紀三十年代，啟用超過六十年後，長年失修殘破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甚至一度考慮要將之宣佈為危樓，委員會亦有意放棄。

此時（1931年），位於大會堂旁邊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總行不敷應用，向政府建議購下大會堂合併發展，興建為當時全港最大的建築物；為此，儘管委員會擁有建築物999年期使用權（但無土地擁有權），到政府決定將大會堂西翼皇家劇院拆卸，將土地售予匯豐銀行時，不僅與大會堂無大關係的一般市民漠不關心，惟殖民地政府馬首是瞻的上流社會，自然亦不會有人反對；不僅如此，西翼何時動工拆卸的年份，亦顯然沒有確切的記載，估計是在1933年至1935年間，真有點兒「死於非命」的感覺！



■舊大會堂內的皇家劇院1916年3月上演《屋中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劇照。

要待解決的社會民生問題眾多，興建新的大會堂亦無法引起關注，直到1953年夏天，戰後為促進華人及英人友好關係成立的中英學會（Siro-British Club）的一群人士，包括秘書Tony Braga，轄下中英樂團指揮白德（S.M.Bard），成為核心，組成大會堂委員會（City Hall Committee），成員中包括了多個藝術範疇的人士，由當時著名藝術鑑賞家、藝術家賴恩（Fr. Thomas Ryan）擔任主席，一方面在英文報章發動輿論，倡議重建大會堂，要求政府履行當年承諾；另一方面，聯同七十個團體上書港府，正式提出要求，很快地，政府便作出回應，會由政府全資興建新的大會堂。

委員會對如何籌集建築費用的擔心亦一掃而空了。而且很快地，同年9月間便公開展示了未來的大會堂模型，當時亦引起了好些爭論，這些爭論多是投函到英文報章。（待續）

■《現代香港的起點——大會堂50年的故事》封面。

逢每月最后一周五刊登

文、圖：周凡夫

政府失信民間爭取

舊大會堂命運未能引起更大關注的另一原因，在於當時歐洲戰雲密布，而日本侵華亦帶來政局動盪，港英政府及社會都聚焦在日趨逼近的戰爭危機，拆卸西翼時政府會撥地重建的承諾，亦乏人根究了。餘下的大會堂東翼殘留到香港淪陷，被日軍佔領充作軍人俱樂部，戰後1947年更以投標方式出售，為中國銀行以當年的新高價紀錄——每平方英尺251.44元投得，興建中國銀行總行，舊大會堂的殘跡全部消失，但亦因此喚起一群社會人士組成一個委員會去爭取興建新的大會堂。

然在戰後百廢待興，